

巴与蜀的蛇、象探讨^①

黄剑华

内容提要：《山海经》与《楚辞》有“巴蛇食象”或“吞象”的传说，究竟是什么含义呢？古代巴、蜀在农业生产方面都是栽种水稻为主，文化习俗相同，在崇尚与观念方面也是相互渗透。譬如古代巴人崇虎、崇蛇，将虎与蛇作为族群的标识；古蜀先民崇鸟，崇拜龙、蛇，对虎也有敬崇之心，并对大象有特殊的崇奉之情。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对此就给予了充分的揭示。巴与蜀关系密切，但也常闹矛盾，有时候还要发生战争。由此可知“巴蛇食象”或“吞象”，比喻的便是巴、蜀相争。正是由于蛇、象之争，从而为秦朝统一巴、蜀提供了机会。

关键词：古代巴蜀；稻作农业；龙蛇崇拜；白虎崇拜；《山海经》；蛇与象

一、巴与蜀的族群特点与神话传说

《山海经》与《楚辞》有“巴蛇食象”或“吞象”的传说，通常认为巴蛇是指巴人或巴国的族群标识，而象则是指蜀地产象、古代蜀人对大象有特殊的崇奉之情。“巴蛇食象”或“吞象”之说，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要深入探讨其含义，还要先从巴与蜀的族群特点说起。

中国自上古以来，便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有着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巴与蜀是先秦时期西南地区两个强大的宗主国，从文献记载看，巴、蜀的崛起与兴盛，具有天时、地理、人和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便是部族与氏族之间的相互联姻，或者结成联盟。汉代司马迁对西南地区部族众多的情形曾作了真实的记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其西其北又以什

^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边缘地域下古蜀地区文明起源与早期演进研究》（批准号：21BZS017）的阶段性成果。

数。汉代班固在《汉书》中也对此作了同样的记载。这是汉代的情况，上溯至夏商周时期，西南地区大大小小的部族数目可能更多。据学者们研究，在秦灭巴、蜀之前，巴、蜀境内至少有百数十个大小部落，这些部落首领也就是小诸侯，或称为“戎伯”。蒙文通先生曾精辟地指出：“蜀就是这些戎伯之雄长。古时的巴蜀，应该只是一种联盟，巴、蜀不过是两个霸君，是这些诸侯中的雄长。”“可见巴、蜀发展到强大的时候，也不过是两个联盟的盟主。”这种多部族联盟的形式，正是巴蜀与中原和其他地区在社会结构方面的不同之处。

蜀国与巴国都是先秦时期西南地区的部族联盟，但缘起并不相同，部族关系也各有特点。蜀国的历史，见诸文献记载的，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朝代。譬如扬雄《蜀王本纪》就说“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蒲泽）、开明”。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中对古蜀早期历史的记述，也极其简略：“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又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槨，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槨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蜀国上古时期的史料确实太少了，所以扬雄和常璩只能概述。史籍中关于古蜀的记载虽然语焉不详，给人以太多的传说与推测之感，但也并非虚构，后来的考古发现便给予了充分的印证。譬如众所周知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成都宝墩古城遗址群、成都商业街开明王朝船棺葬、成都十二桥商周时期的建筑遗址等重大考古发现，就揭示了古蜀文明的悠久与灿烂辉煌。

关于巴国的缘起，古代文献记载也不多，同样具有较浓的传说色彩。根据《后汉书》卷八六记述：“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暉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之后巴氏子务相被推立为首领，称廩君。接着，廩君射杀了盐水神女，“廩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后来，“廩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在《世本》与《水经·夷水注》中，也有类似记述。廩君崛起于什么时候，文献记载没有细说。巴氏与其他部族的关系倒是清楚的，应该属于联盟与臣属形式。至于巴氏的传承关系，史籍与地方志书中也是语焉不详。还有就是巴族的起源，也有些含糊不清。例如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山海经·海内经》说巴人乃太皞之后，“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这些记述，均有较浓的传说色彩。但也说明了廩君蛮可能是巴人的主体族群之一，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氏族与部落，共同组成了巴国。有学者认为清江地区，或认为陕南汉江流域，还有认为嘉陵江流域、长江三峡地区等，都是巴人的早期发祥栖居之地。重庆涪陵小田溪巴人墓葬出土的虎钮钲于、铜钲、编钟等，就是巴国王室的遗存。考古出土的巴人青铜钲于多以虎为钮，就表达了使用者是以白虎为图腾的廩君后裔。崇虎是巴人习俗中的一大特点，巴人喜欢双结头饰，因而被称为“弼头虎子”。巴人使用的青铜剑、青铜矛上，常雕铸有双结的人像。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又说巴国“其属有濮、賸、苴、共、奴、獯、夷、蜃之蛮”。由此可知，除了廩君蛮，还有濮人与賸人等，都是巴国的重要部族。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嘉陵江流域有善于射虎的板楯蛮，板楯蛮有罗、朴、咎、鄂、度、夕、龚七姓，也是巴国的重要族群之一。巴国因为是由多个族群构成的国家，所以既有崇拜白虎的氏族，也有畏惧白虎和射杀白虎的部族。



虎纽锺于（藏于四川博物院）



广汉出土的西周铜钲，刻有虎纹与三星（藏于四川博物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巴国的族群中还有以蛇为族徽或图腾的，文献中常见有“巴蛇”之称，就揭示了这种情形。譬如《山海经·海内南经》就有“巴蛇食象”之说，《楚辞·天问》曰：“有蛇吞象，厥大何如？”《路史·后记》罗苹注云：“所谓巴蛇，在江岳间。”《山海经·海内经》也说“有巴遂山，……有黑蛇，青首，食象”，此外《山海经·北山经》《山海经·北次三经》等篇章中都有关于大蛇的记载，袁珂先生认为：“《山海经》多称大蛇，均巴蛇之属也。”这里面有几个关键问题需要思考和探讨，第一个问题是巴与蛇究竟是什么关系，第二个问题是蛇与象又是什么关系。

我们先说巴与蛇的关系，《山海经》中关于“巴蛇”的记载颇多，为什么将巴与蛇联系在一起？二者究竟是什么含义？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学者们对此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有认为很可能是因为古代巴地蛇多，常见有蟒蛇出没的缘故，所以巴人对蛇就有了特殊的敬畏与崇奉。上古时期，中国各个族群都流行对动物的崇尚，比如有的崇虎，有的崇鸟，有的崇鱼，有的崇熊，有的崇蛇，有的崇象，还有的部落或氏族则以其他动物作为族徽或标识。这些动物，有的与狩猎或捕鱼有关，有的与居住生存环境（山林、平原或江湖沼泽）相关，还有的则与农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也有人认为，巴国和蜀国都是栽种水稻的区域，崇蛇与稻作农业的关系非常密切，是长江流域和南方文化系统的特有现象。由此可见，巴人崇蛇不仅是生存环境使然，也与稻作农业有着密切关系。

其次是蛇与象的关系，大象是动物中的巨兽，在自然界中大象的体量比蛇类要庞大很多。《山海经》中说大蛇要吞食大象这样的巨兽，那是难以想象的，未免过于夸张了，显然不合情理。《楚辞·天问》因此提出了疑问，所以世人对“食象”或“吞象”之说只能当作神话来看，或者视为纯属虚构的传说而已。但是，《山海经》中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如果换一个方式思考，将蛇与象作为不同族群的标识，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可见《山海经》中说的“巴蛇食象”或“吞象”，不过是一种比喻或象征的说法。假如说蛇是古代巴人的标志，那么大象就是古代蜀人的象征了。

从巴与蜀的书写方式来看，也有如蛇似象的比较显著的特征。汉字讲究象形，“巴”字与蛇的形态就很相似，上面像是蛇首，下面像是弯曲的蛇身与蛇尾；而“蜀”与象的形态也

非常相似。《说文解字》说：“巴，虫也，或曰食象它。象形，凡巴之属皆从巴。”所言“食象它”，也就是“食象蛇”。《说文解字》又说：“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娟娟。”过去通常认为，蜀与蚕的关系非常密切，古籍中就多有提及，例如《韩非子·说林下》就说：“鱗似蛇，蚕似蠋，人见蛇则惊骇，见蠋则毛起。”陈奇猷解释曰：“蠋，桑虫也。”刘安《淮南子·说林训》也说：“今鱗之与蛇，蚕之与蠋，状相类而爱憎异。”有人认为蠋是桑虫，与蚕相异，但都与蜀相关。也有将蠋写作蜀的，或认为蠋就是野蚕。任乃强先生就认为：“蜀山氏居于何地，暂可不论。论蜀之为字，盖即原蚕之本称也。”“故《淮南子》云：‘蚕与蜀似而爱憎异。’其所云‘蜀’，即原蚕，今云野蚕者是也。”又说：“是故‘蜀山氏’，即古人加于蚕丛氏之称也。其义皆谓最先创造养蚕法之氏族。”任乃强先生的论述，当然是很有见地的一家之言。其实，古蜀先民不仅很早就养蚕，与大象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三星堆与金沙遗址都出土有数量可观的象牙，就是很好的说明。三星堆青铜造像群中有象鼻的造型，大型青铜立人像双手献祭的可能是弯曲的象牙，就揭示了古代蜀人对大象的崇奉之情与特殊关系。故而《山海经》中说“巴蛇食象”，以此来形象地比喻巴蜀相争，对其含义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二、巴与蜀的地理环境与稻作农业

巴与蜀地域相邻，民风习俗比较相同，在文化与经济上的往来一直比较密切。巴与蜀最大的共同之处是农业生产，都是以稻作农业为主。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杜宇教民务农，使蜀国的经济变得非常繁荣，巴国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就是这种密切关系的一个最好例证。

我国的农业起源甚早，在原始社会长江流域就出现了稻作农业，黄河流域已出现了旱作农业。正是由于史前时期就形成了南北两种农业体系，从而促进和形成了南北文化体系发展的各自特色。对自然的认知，对祖先的传说，古蜀与中原都有各自的说法。譬如神话传说方面，中原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崇尚的主神是黄帝，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崇尚的主神是帝俊。在中国的传世文献中，代表中原文化传统的一些古籍如《竹书纪年》《世本》，以及后来的《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帝王世纪》等，都是以黄帝作为传说中心的。而代表南方文化传统的《山海经》中关于帝俊的记载，则构成了一个帝俊神话传说的体系。

根据传世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农、后稷，都是推动农业发展的先驱。《周易·系辞下》中就有关于神农的记载，说“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古籍中又有神农“始作耒耜，教民耕种”的记述。意思是说远古时代先民们渔猎为生，神农氏用木制作农具，才开创了人类进入原始农业社会的新纪元。在汉代人的著述中，如刘安《淮南子·修务训》、班固《白虎通德论》等，也都记述有关神农教民播种五谷的传说。而传说中的后稷，也因播种百谷、教民农耕，而被视为农事之创制发明者。如《山海经·大荒西经》就说“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这是古籍中关于农神与五谷起源最明确的记载了。后稷是各族心目中播种五谷的农神，而帝俊是后稷之父，可见帝俊与稻作文化的起源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神农氏因宜教田辟土种谷以振万民（山东嘉祥武梁祠汉代画像临摹图）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农神后稷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长江上游，和古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文献记载来看，古蜀国很早就已成为一个生产水稻的中心。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海内经》已有“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的记载。都广之野，通常是指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文中的“都广”，《艺文类聚》与《太平御览》等引用古本则作“广都”，杨慎《山海经补注》解释为“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袁珂先生认为“衡以地望，庶几近之”。后稷是公认的农神，而葬在都广之野，可见与古蜀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山海经·海内经》中还有“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的记述，《山海经·大荒西经》也说“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这些记述透露了长江上游是最早栽种稻谷的地区，也是中国早期农业的发祥之地。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山海经》中有很多篇章为蜀人所撰写，“我认为《海内经》这部分可能是出于古蜀国的作品”，记述的古蜀国境内的事情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秦汉以来的史书，对长江上游与西南夷地区的稻作农业也有较多记载。学术界通常认为，汉代所谓的西南夷，主要指巴、蜀之外的西南少数民族，在族属上包括夷、越、蛮三大系统。例如将氏羌系称为“夷”，将百越系（包括濮或僚）称为“越”，将南蛮系苗瑶语族称为“蛮”。古代巴蜀与西南夷属于典型的多民族区域，生活习俗虽然各有特色，却又有较多的共性，最为显著的就是稻作文化了。《汉书·地理志》对此就有较多记述，说巴蜀“土地肥美……民食稻鱼”，说“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刀耕水耨，民食稻鱼，以渔猎山伐为业”，又说粤地近海“男子耕农，种禾稻苧麻，女子桑蚕织绩”。由此可知在长江以南，包括百越与西南夷的广阔区域内，诸多民族都种植稻谷，衣食住行都与稻作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通过文献记载可知，古蜀国种植稻谷的历史非常悠久，考古发现对此也给予了充分印证。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成都商业街船棺葬以及新津宝墩古城等约十座新石器时代的古城遗址，充分揭示了古蜀文明的源远流长和灿烂辉煌，也说明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繁荣，而这些一定是要依靠发达的经济状况作为基础的。古蜀国能够成为夏商周时期长江

上游的文明中心，与大量种植栽培水稻很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古蜀国的稻作农业很可能在当时已居于领先地位，从而为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充裕的保障。《山海经·海内经》说都广之野生产的是“膏稻”，膏是肥沃与味美之意，可知这里很早就生产优良稻谷了。《山海经·西山经》还记述了当时的“神祠礼”，要“糴以稻米，白菅为席”，说明了稻米不仅满足人们的日常之需，还用来敬献神灵，是举行祭祀等重大活动中的珍贵祭品。这也是古蜀国稻作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对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山海经》中的人身龙首神、人身而龙首的神计蒙、龙身而人头的雷神



《山海经》中乘两龙的东方句芒、南方祝融、西方蓐收

古蜀国稻作文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对龙、蛇的崇拜。《山海经》中就记载了奇异的烛龙、鸟身龙首神、人面龙身神等，还有许多关于乘两龙的记述，例如《山海经·海外南经》说“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山海经·海外西经》说“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僦九代，乘两龙”；又说“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山海经·海外东经》说“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山海经·海内北经》说“冰夷人面，乘两龙”；《山海经·大荒西经》说“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等等。在先民的心目中，龙是由多种动物特征拼凑起来的一个神奇角色，其主要特征则是各种水族为主体的，如扬子鳄、蛇、龟、鱼等，都是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的动物。在一

定意义上,也可以说龙的崇拜是随着稻作文化由南而北的传播而形成的,并在传播和流传中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后来随着南北文化的交流融合,龙的影响不断扩大,也就成为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炎黄各族的共同崇拜象征。



《山海经》中的操蛇怪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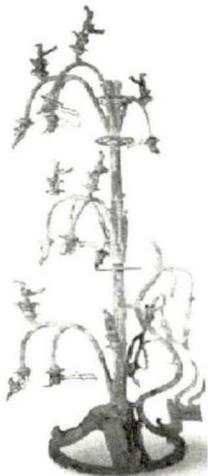


《山海经》中的禺强践蛇



《山海经》中的夔兹践蛇

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经》中还有很多关于蛇的记载。《山海经·海外东经》等就有“食稻啖蛇”“食稻使蛇”等记述,《山海经·北山经》还有“其神皆人面蛇身”等说法,这些记述中既有常见之蛇,也有神化了的或作为图腾象征的蛇。如《山海经·北山经》说“其神皆人面蛇身”,《山海经·中山经》说有“怪神,状如人而载蛇,左右手操蛇”。《山海经·海外西经》说:“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又说:“轩辕之国……人面蛇身。”《山海经·海外北经》则说:“钟山之神……人面,蛇身。”又说:“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山海经·海外东经》则有“食稻啖蛇”与“食稻使蛇”的记述,又有“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的记载。在《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等篇章中也有“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的记录。凡此等等,都是极为重要的研究资料。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树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青铜爬龙柱形器

有学者认为，长江流域稻作地带的先民们自古就存在蛇崇拜，这一古老的现象可能远早于龙在南方地区的出现。譬如何星亮先生就认为：“龙是蛇图腾的神化，是在蛇的基形上形成的。”对蛇的敬畏崇拜在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区域也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中国古代对蛇的崇拜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蛇的神化，崇尚的极致便是将蛇演变成了龙。“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龙的地位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但是蛇仍然不失为一种令人敬畏的神物”。例如《山海经》中既有许多“乘龙”之说，又有大量“践蛇”的记述，反映的便是龙蛇信仰并存的现象。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众多珍贵文物之中，就有青铜柱形器上长有羊的弯角和胡须作昂首嘶吼状的神龙，有铜龙头形饰件以及青铜龙虎尊上以高浮雕铸成的游龙，还有青铜神树上姿态矫健的神龙，大型青铜立人像身着龙纹左衽长襟衣等等，就反映了古代蜀人对龙的崇拜。三星堆二号坑还出土有多件残断的铜蛇，蛇头宽大上昂，背上有镂空的刀形羽翅，同时出土的还有蟠曲状的蛇形器，上有黑彩绘成的纹饰。成都金沙遗址亦出土有多件石盘蛇。这些出土资料，则揭示了古代蜀人对蛇的崇奉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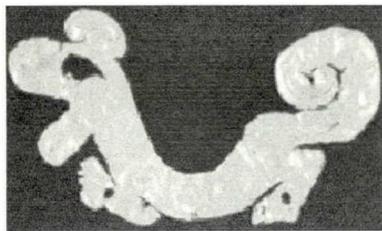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铜蛇



金沙遗址出土的石盘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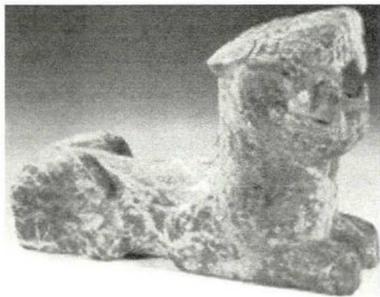
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结合起来看，《山海经·海内经》说黑水青水之间的若木附近“有灵山，有赤蛇在木上”，《山海经·海内南经》也说“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纓，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藟，其名曰建木”。《淮南子·坠形训》对说：“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都广就是成都平原，是古蜀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王朝的建都立国之地。《山海经》中所说的赤蛇与黄蛇皆是神奇之物，或者就是神龙的化身。我们由此可知，古蜀先民对龙与蛇的崇拜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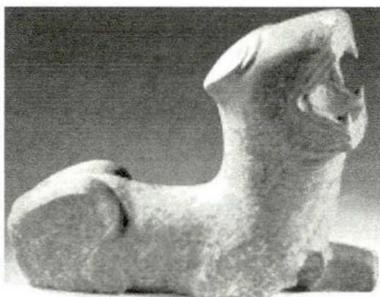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金虎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虎，通体嵌饰有绿松石



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虎之一



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虎之二



成都百花潭中学出土的虎纹铜戈



郫都区独柏树出土的铜戈，上有虎纹与巴蜀图语及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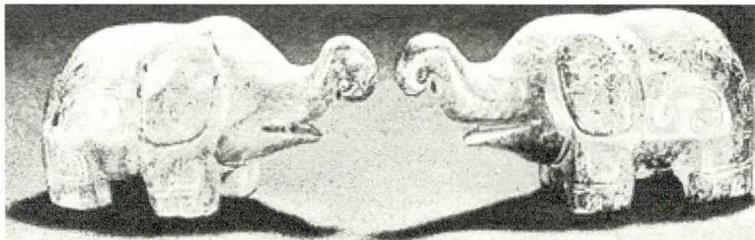
古代巴人和古蜀先民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农业生产方面都是栽种水稻为主，在崇尚与观念方面也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古代巴人崇虎、崇蛇，将虎与蛇作为族群的标识；古蜀先民崇鸟，崇拜龙、蛇，对虎也有敬崇之心。三星堆出土有金虎，金沙遗址出土有石虎，就说明了巴人崇敬白虎的习俗已渗透到了蜀地。这种对虎的崇尚，在巴、蜀地区出土的青铜兵器上也有充分的反映。这些都说明了巴、蜀在文化上的密切关系，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的渗透与影响由来已久，在很多方面已浑然交融，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已经很难截然分开了。特别是崇蛇的观念，巴与蜀也是相似的，区别在于蜀人崇拜龙、蛇，而巴人崇蛇更为强烈，把蛇作为了巴人族群中的一种象征。这也说明了巴与蜀在区域文化特色方面，既有很多的相同之处，又有一些不同的个性特点。

三、巴与蜀的气候变化与象群迁徙

关于大象，从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来看，早在商周时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曾有象群活动。在《吕氏春秋·古乐篇》中就有“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的记述。学者们通常认为“服象”是说驾驭大象用以作战之意，有的认为商人即为殷人，有的则认为商人应为南人，或为南蛮之人，所以才有周公派兵逐之远去的说法。但殷人服象很可能是确实有过的一种历史状况。

徐中舒先生在主编的《甲骨文字典》中曾指出，“据考古发掘知殷商时代河南地区气候尚暖，颇适于兕象之生存，其后气候转寒，兕象遂渐南迁矣”。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也对此作过论述，认为“古者中国产象，殷墟所出象骨颇多，昔颇疑其来自南方。然卜辞中有获象之文，田狩所获，绝非豢养物矣。《孟子》谓周公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吕氏春秋》

云，殷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则象中国固有之，春秋以后乃不复见”。罗振玉先生《殷墟书契考释》中也认为，“象为南越大兽，此后世事。古代则黄河南北亦有之。为字从手牵象，则象为寻常服御之物。今殷墟遗物，有饕象牙礼器，又有象齿，甚多，卜用之骨，有绝大者，殆亦象骨，又卜辞卜田猎有‘获象’之语，知古者中原象，至殷世尚盛矣”。与象有关的古地名、古文字其实不少，例如《禹贡》中的豫州，学者们认为“豫”即为象、邑二字合文，反映了殷代河南曾是产象之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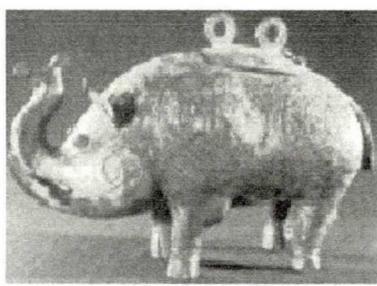


河南安阳殷墟5号墓出土的玉象

从考古发现看，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屡见象字，并有“获象”“来象”之文。甲骨文中的“象”字，以长鼻巨齿为其特征，说明殷人只有经常与象接触，对象非常熟悉，才会有这种形态逼真的象形字。安阳殷墟曾发现有两座象坑，分别埋有大象与幼象，一座坑内埋有一头幼象和一个象奴，另一座坑内埋有一头幼象和一只猪。殷墟还出土有各种象牙制品，妇好墓还出土有惟妙惟肖的玉雕象。这些都应该是殷商时期黄河流域中原一带有过大象的见证。有些学者因而认为，“可见，当时在中原地区已驯养象，并有较多的野象”。正因为中原地区有象，从而为殷人获取象牙提供了便利。由此来看，殷墟出土有丰富多样的象牙制品也就不难理解了。



湖南醴陵出土的商代青铜象尊



陕西宝鸡国墓地出土的青铜象尊

古代的长江流域也是有象的，从文献记载看，《诗经·鲁颂·泮水》有“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之咏，淮夷将象牙作为进献之物，说明江淮流域也曾是产象之地。《左传·定公·定公四年》记载说，楚昭王在长江中游与吴王阖庐的人马作战失利，逃避吴国军队追击时，曾将火炬系于象尾，使部下“执燧象以奔吴师”，才得脱险。这说明楚国驯养有大象，危急时候才能驭象作战，利用象的强悍，冲击吴军，取得奇效。在《国语·楚语》中有“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尽乎”的记述，也透露了长江中游曾是多象之地。通常解释，巴浦是指巴水之浦。徐中舒先生认为，巴浦当即汉益州地。联系到与之相

关的一些记述，如《山海经·中山经》说“岷山，江水出焉……其兽多犀、象”，徐中舒先生认为“此皆益州产象之证”。可知古代的江淮流域和四川盆地都曾是产象之地。《华阳国志·蜀志》也提到“蜀之为国，肇于人皇……其宝则有璧玉……犀、象”，反映的可能正是这种真实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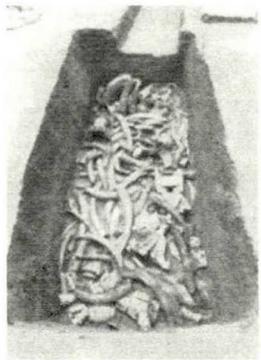
根据环境考古材料揭示，商周时期长江流域和四川盆地境内，气候比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湿润温暖，土壤肥沃，林木茂盛，河流纵横，湖泊众多，而且有大量的湿地，更适宜鸟兽和大型动物生存，很可能曾是亚洲象群的重要栖息出没之地。那个时候，大象曾是这些地区的人们非常熟悉的一种动物，而且人与象之间有着非常亲和的关系。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兽首冠青铜人像，那夸张而奇异的冠顶装饰物，活脱就是卷曲象鼻的写照。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纵目人面像，鼻梁上方高竖的卷云纹装饰也使人油然联想到卷曲的象鼻，是一种充满了想象力的象征表现手法。还有彭县濛阳镇竹瓦街出土的商周窖藏青铜器中，双耳为长鼻形立体象头的铜罍，其象头和长鼻以及突出的象牙，堪称是对真实大象栩栩如生的摹拟。这些都说明了古代蜀人对大象形态的熟悉，只有经常和象接触才会达到如此熟悉的程度，应是蜀地产象的见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大量烧骨碎渣中，经初步鉴定，有猪、羊、牛的肢骨和头骨，还有被火烧过的象的门齿、臼齿等。这些烧骨渣中的象的门齿与臼齿，显然也透露了蜀地产象的信息。还有三星堆曾出土有相当数量的象牙，其中一号坑出土象牙 13 根；二号坑出土象牙 67 根，一般长 80~100 米；经鉴定这些象牙均属于亚洲象种。在成都金沙遗址也出土了大量的象牙，数目比三星堆更为庞大。经学者们研究，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象牙显然并非来自遥远的异域，很可能就是古蜀本地所产，也可能是从栖息于长江流域的象群中获取的。这些出土资料也告诉我们，古代蜀人与大象应该是和谐相处，关系比较密切，也可能有驯象或饲养象群之类的情况。古人将大象视为蜀的象征，也就合乎情理了。将“巴蛇食象”比喻为巴蜀相争，也说明蜀国比巴国强大，但巴国不甘示弱，有“吞象”之心，或者以此来表达巴人的强悍与自信。可知《山海经》中的记述，确实很生动也很有趣，有着丰富的含义。



三星堆青铜纵目人面像



四川彭县濛阳镇竹瓦街出土的铜罍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象牙情景



考古发掘揭示的金沙遗址象牙堆积坑

象群后来南迁了，其主要原因应该是气候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次是大量的开发活动，造成了生态植被的改变；再者是人们对咒、象等猛兽采取了驱逐做法；由于这些诸多人为因素，象群离开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往南迁徙到了亚热带地区。

四、巴与蜀的区域文化与融合发展

巴与蜀是友好邻邦，古人常将巴蜀连称，可见二者关系非同一般。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就记述，在大禹治水、划分九州的时候，就“命州巴、蜀，以属梁州”，后来大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又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这些记载说明，巴蜀在先秦时期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属于同一战线的同盟国关系，所以常常一起参加很多重要的政治军事行动。郑樵《通志·氏族略》引盛弘之《荆州记》说“昔蜀王桀君王巴蜀，王见廩君兵强，结好饮宴，以税氏五十人遗廩君”。这也说明巴与蜀的同盟友好关系，可谓由来已久。联盟带来的好处，是使双方都获得了壮大。



重庆璧山出土汉代石棺上刻画的巴人舞

在经济方面，巴、蜀也相互依赖，互相促进，同样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例如早期的盐业开发，在蜀地与巴地都很兴旺。在水陆交通与贸易上，水陆两途都是巴、蜀双方所充分利用的。长江上游与中下游的舟船往来，秦陇与巴蜀之间的栈道通商，南丝路上的远程贸易，都是古代巴、蜀共享和互利的行为方式。还有巴、蜀地区的工商业，也是关系密切，互利互惠，传统悠久。这对促进巴、蜀文化与经济的兴旺，对加强巴、蜀之间的密切关系，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巴与蜀关系密切，但也常闹矛盾，有时候还要发生战争。《山海经·海内南经》中所言“巴蛇食象”，就透露了巴、蜀之间复杂的关系，曾发生过争战。从文献记载看，在开明王朝向东拓展疆域的时候，曾越过嘉陵江，征服了巴人的许多地方。蜀王鳖灵曾率军征服了嘉陵江以东的大片地区，并占领了阆中。例如《太平寰宇记》卷八六记载阆中有仙穴山，引《周地图记》说“昔蜀王鳖灵帝登此，因名灵山”。《舆地纪胜》卷一八五也说“鳖令庙，灵山一名仙穴，在阆中之东十余里宋江上，有古蚕丛帝开明氏鳖令庙存焉”。在巴、蜀相争的过程中，双方发生了多次战争，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就有“巴、蜀世战争”的记载。《太平寰宇记》卷七二又有“蜀王据有巴、蜀之地”的记述，指的就是开明王朝东扩的结果。可见蜀国比较强势，巴国处于弱势地位，难以抵挡蜀国的进攻，被蜀国攻取了不少地方。蜀王占领的应该是巴国的部分地区，而非巴国全部领土。据《史记·楚世家》与《六国年表·楚表》记载，开明王朝还曾出兵伐楚，攻取了楚的兹方（今湖北省松滋市），势力到达了鄂西的清江流域。《方輿胜览》与《太平寰宇记》中也有相关记述，徐中舒先生认为有些史料“虽出自传说，但清江原为蜀地，则为不可否认的事实”。蜀国通过征战占领的有些地方，后来又被巴国夺了回去。譬如巴国夺回曾被蜀国占领的阆中，重新占据嘉陵江以东地区，并在阆中建立了都城，就是例证。史籍中还有“昔巴、蜀争界，久而不决”“巴、蜀常相战争”的记述。说明巴、蜀之间在疆域方面的相互争夺由来已久，成为两国矛盾的主要根源。到开明王朝十二世的时候，巴、蜀的关系依然紧张，矛盾已有扩大与加剧的趋势，双方已处于敌对状态。常璩《华阳国志》就记述了开明王朝后期蜀王与巴国开战的情形，《华阳国志·巴志》说：“蜀王弟苴侯私亲于巴，巴、蜀世战争。周慎王五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华阳国志·蜀志》说：“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仇，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开明王朝末代蜀王因为弟弟苴侯私下与巴王为好，对此大为恼怒而出兵攻巴，发动了一场极不明智的战争，很显然是个错误；苴侯和巴王向秦国求援，也是严重失策。秦惠王利用了这个机会，派司马错率领秦军伐蜀，很快就攻取了蜀国与巴国。

秦并巴、蜀之后，打破了巴、蜀之间的疆域隔阂，将蜀国和巴国都纳入了秦朝统一的版图和行政管理。巴蜀地区由于物产丰富，从而为秦朝统一天下提供了充裕的人力资源与物质基础。秦朝曾采取了很多重要措施，以加强对巴蜀的统治，譬如修建城市，划分州县，鼓励商贸，并通过大量移民，将北方和中原的很多东西输入了巴蜀地区，促使并加快了巴蜀区域文明与华夏文明的融合。巴蜀文化由此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既保留了原先巴蜀民俗民风传统中的精粹，也吸纳和融入了许多新的因素，在文化教育与商贸科技发展等诸多方面都增添了新的内涵，因此而活力更加充沛，更为兴旺而富有魅力。自秦朝以来这种统一格局下的行政管理，以及文化经济方面的创新融合，有利于巴蜀地区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也更加密切了成渝两地的关系。

总而言之，巴蜀文化刚柔相济，文武兼备，融合发展，自古以来在巴蜀地区的发展历程中曾谱写了绚丽多彩的篇章。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